责编：泓佐　E-mail:ccps6235@163.com　Tel:010—62806235

◆战略视角

中欧：极具潜力和空间的战略合作伙伴

□赵　晨

习近平主席 3 月底将出访荷兰、法国、德国和比利时四个西欧国家，并访问欧盟总部，习近平主席将成为有史以来首位访问欧盟总部的中国国家主席。外交部长王毅在习近平主席出访前表示欧洲在今年的中国外交中将处于优先位置。欧盟在 2012 年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 重返亚太 ”口号，在亚太地区推行“ 再平衡 ”战略之后，也开始重点关注亚太地区，着力加强与中国的政治联系。2013 年 11 月，中欧领导人在北京制定了《中欧合作 2020 战略规划》，将“ 和平与安全 ”置于“ 繁荣 ”“ 可持续发展 ”和“ 人文交流 ”等合作目标之前，充分显示了双方对提升政治关系的重视程度。

发展中欧政治关系是提升中欧“ 极具潜力和空间的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的有效途径。

如何评估当前的中欧关系

中欧之间没有重大的地缘政治利益纷争。在香港、澳门回归中国后，现在没有欧洲国家在亚洲拥有重要殖民地或大量驻军。中欧关系的基石是经贸关系，欧洲主要是从商业利益的角度思考中欧关系，它没有真正的对华地缘政治战略。中国没有被大多数欧洲国家看作有军事威胁，欧洲对中国的政治兴趣并不大。总体看，中欧地缘政治没有消极妨碍因子，但在塑造双边关系的积极性方面还有很大欠缺。

中欧防务安全合作是中欧政治关系的薄弱环节，目前仅限于数量很少的政策对话，比如中国定期参加慕尼黑安全对话会议等多边论坛；核安全方面也局限在和平利用核能的科技合作，如 2004 年中国与欧盟签署“ 和平利用核能研究协议 ”；中欧海外军事合作也开始得很晚，而且主要是一些“ 软 ”活动，如战略对话，维和训练，军队外交，教育互换，港口访问，以及初级层次上的联合演习。中欧 2005 年年底开始启动针对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的副部长级对话，中国 2009 年开始参加联合国安理会要求并授权的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活动，不过，这是与欧洲开展真正的联合军事行动的最突出的案例。

中欧在政治理念和世界观方面也有较大差异。中欧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为数众多的欧洲媒体和政治人物认为中国没有遵循西方的规则，总是从自己的战略利益出发看待世界事务。他们认为中国仍在违反人权，没有实施西方的法律标准，而且不愿走向他们定义的民主，认为中国政府在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稳定。欧洲目前有一种有影响力的观点，认为作为亚洲的主要崛起大国，中国一直在挑战西方的模式、价值和利益，中国目前正在崛起，它在经受一个半世纪的屈辱后，现在正在努力向世界发出更高分贝的政治声音。当然，这只是硬币的一面，硬币的另一面是中国和欧洲也有为数众多的价值观共同点，比如认同多边主义和国际机制的重要性，认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反对美国设立关塔纳摩监狱等违反国际法行径，重视气候变化的全球影响，等等。

防务安全、地缘政治，以及价值观都属于双边关系的“ 硬核 ”部分，受历史和文化因素影响，是双边关系相对难以“ 撬动 ”的部分。不过，我们身处后冷战的时代，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在降低，军事安全的重要性相对弱化，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与具体经济、社会事务相关的非传统安全，如经济安全（特别是金融安全）、恐怖主义、毒品走私、跨国犯罪、传染疾病、信息安全、文化安全，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政府间磋商和非官方接触交流的重要议题。20 世纪 90 年代后，中国开始逐步加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客观上加深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相互依赖程度。当前中国已经全面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各种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深入参与世界经济、社会和政治事务。经济基础决定政治上层建筑，经济全球化已使得中欧关系成为新型洲际相互依赖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 2011 年达到 5672 亿美元，2011 年中欧人员往来达到 500 万人次。如此大的经济和社会交往规模，不可能自然而然发生，它需要在多领域，中欧各级政府和社会各层次进行频繁的磋商和合作，并协调解决其中的各项问题。中欧的部门对话领域相当广泛，涵盖从科技到市场规制，从环境问题到教育、信息社会，从反恐到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的各项议题。中欧在全球治理的许多问题上有共同利益，特别是，它们都认可多边国际组织和多边国际体系。无论是对全球环境治理、国际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担心，还是对非法移民、国际犯罪、全球健康问题（如艾滋病和非典）等各项问题，中欧均持相似的态度和相近的国际立场。

在机制建设方面，中欧之间的政治交往的制度化已经处于较高水准，双方协商涉及的领域宽度已经与美欧之间相差不远。自 1998 年 4 月亚欧首脑峰会确立中国—欧盟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后，中欧政治关系在制度化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2003 年 10 月，中欧确定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随后双方先后建立起高级别战略对话、经贸高层对话和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三大机制；截至 2012 年 9 月，各领域对话与磋商机制也从 2003 年的 19 个增加到 60 多个。中国外长与欧盟轮值主席国外交部长和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根据需要随时召开。自 2010 年开始，由中国共产党倡议，中欧开始每年举办“ 中欧政党高层论坛 ”。中欧议会机构之间的机制性联系也在增强，全国人大和政协也与欧洲议会和欧洲经社理事会建立了定期交流机制。但是如果我们拿欧美间的外交对话机制作参照物的话，我们发现在深度方面中欧政治对话机制还有一定欠缺，主要体现为三点：一是在对话的前沿性方面还有欠缺，欧美对一些市场管制、高科技发展协调和国家安全前瞻问题进行了密切的沟通；二是欧美间有专门针对中国的战略对话，即副国务卿/副外长级的“ 关于中国的跨大西洋战略对话 ”，合作应对中国崛起给美欧造成的挑战，而中欧间却没有类似协调机制；三是欧美之间还设有协调部门级对话的专设机构，即“ 高层工作组 ”和“ 新跨大西洋议程专责小组 ”，设有专职主管（副国务卿或助理国务卿级别），以便于更好地统筹协调双方在各领域的矛盾和问题。

如何深化中欧关系

中国对外奉行“ 不结盟 ”外交原则，在地理上与欧洲相距遥远，政治道德规范和实际地缘状况决定了中欧在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不可能在近期有太大的提升空间。中欧之间的价值观乃至思想方式差异也是短时间内难以弥合的。近年来中欧在人权、达赖、诺贝尔和平奖等问题上发生争执和不快，价值观不同是主要原因。但是，得益于经济全球化，中欧的相互依赖程度在 21 世纪快速加深，中欧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接触不断增多，双边沟通和磋商机制也日趋完善。相较于传统安全和政治理念，这两个侧面的中欧政治往来更为顺畅，遇到的困难也小得多。

未来，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它将成为世界发展更加重要的一部分，中国与世界也将形成更加系统、更加深化和更可持续发展的共同利益。扩大和深化同包括欧洲在内的相关各方的利益汇合点，以构建利益共同体的方式加深中国同世界的联系，是推动实现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和平发展的重要路径。随着中欧经济关系的深化，社会交往的增多，双方碰到越来越多需要协商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进行政治协调。欧洲一体化进程中发生了一种被学界称为“ 外溢 ”的现象，即原初一个领域的问题会“ 外溢 ”到其他领域，引发连锁效应，从而引起双边或多边关系的全方位提升。尽管传统安全和价值观属于较难合作和妥协的“ 硬核 ”，但“ 风物长宜放眼量 ”，如果中欧建立起利益攸关、沟通顺畅的除军事之外的宽领域双边政治关系，也不排除“ 硬核软化 ”的可能。

中欧发展政治关系，可以在某些方面借鉴欧美政治关系的经验。首先，应当加强针对第三方，特别是针对美国的专门对话。美国非常注重在与欧盟的双边机制中讨论其他地区的安全事宜。1995 年美欧峰会发布的“ 联合行动计划 ”中，即表明美欧在世界其他地区共担责任，特别提到它们将“ 共同努力降低朝鲜半岛、台湾和南中国海地区的冲突风险 ”。而中国和欧盟之间则不存在这类专责协调机制。2004—2005 年，在法德等国的推动下，欧盟尝试解除对华武器销售禁令，这一事件刺激了美国国会和政府，它们除了大力阻止之外，也充分意识到需要增强与欧洲的沟通和协调，随后欧美之间启动了关于亚洲的半年一次的官方对话（实际上是只针对中国），对话在欧盟委员会和美国政府间进行，而我们则没有主动发起倡议过针对美国的与欧盟的对话。

其次，中欧政治合作的国际性有待加强。欧盟将欧美关系定义为一种“ 全球性合作伙伴关系 ”，除希望保持欧美双边关系稳固外，它还期望同美国合作在世界范围共同促进世界贸易的自由化和扩展，应对全球挑战，扩展自由民主价值观，促进世界和平、稳定、民主和发展。而中欧关系则更多地被双方定位为地区性双边关系，除了在非洲地区，由于中非关系近年来迅猛发展，欧盟希望中欧非进行三方合作外，它发展中欧关系的想法主要停留在双边层次上，其期望是，通过接触和影响，促使中国深度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不过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意识到，美欧关系商讨议题的全球性也是 2003 年伊拉克战争后才开始的。欧美在其关系逐渐恢复正常后，开始逐渐讨论欧洲之外的越来越多的危机和情况，比如伊朗、苏丹（达尔富尔）、非洲、巴以关系、朝鲜、核不扩散以及涉及范围广泛的非传统安全议题。而现在，如美国学者沈大伟所说，大西洋关系的国际化是大西洋关系的重要特征，而且成为密切关系的新的黏合剂。随着中国世界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的海外利益在世界范围内，在广度和深度上逐渐扩展，有必要考虑进一步加强与欧洲在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协商。《中欧合作 2020 战略规划》中倡议中欧就具有全球重大影响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对话与沟通，加强中欧在非洲、中亚、拉美及双方各自周边地区事务的磋商，这已经是一个好的起点，下一步就是如何在外交和各层交往中逐步落实，双方不妨先从协调领事保护、共同从危险地区撤侨等具体问题上做起。

◆环球瞭望

首尔如何治理环境

□马　斌

上世纪 70 年代，是首尔城市化发展最为迅速的时期，城市人口和经济总量的快速增加，导致了大气和水污染、交通拥堵、垃圾成堆等一系列严重的环境问题。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首尔市开始从政策、规划和制度入手，着力解决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努力使首尔成为世界气候环境的“ 首善之都 ”。

注重能源结构的全面优化

在首尔的能源消费结构中核电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额。2011 年 3 月日本福岛的核泄漏事故，引发了韩国对核电安全性的全面质疑，政府计划通过大力发展太阳能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来逐步减少核电的比重。2012 年 1 月首尔市市长朴元淳宣布，要把首尔“ 从耗能、耗资的城市 ”转换为“ 生产型城市 ”，要节省相当于 1 座核电站的能源，到 2020 年使电力自足率由目前的 3%提高到 20%以上。于是，首尔市政府围绕“ 减少核电，采用新能源 ”实施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如，计划在 2014 年前，在公共楼宇、学校、住宅等 1 万多个建筑屋顶建造 320MW 的太阳能发电站，建成 300 个利用太阳能等新能源的市民发电站和 25 个能源自立小区。利用分散电力和供热系统，建设氢燃料电池发电设施、水处理设施、公园、地铁车辆基地等 13 个 230MW 的设施。研究开发出了即使落差在 2 米也可以发电的小水力水车，以充分利用未被利用的水资源。

同时，为了大幅度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首尔市政府对能源消耗大的楼宇、大中型建筑、独栋住宅、公租房、学校等 12200 多个地方，进行历时 3 年的建筑能源效率改善项目（BRP）。如在地铁 1—8 号线的全部 243 个车站更换了 65 万个环保高效的 LED 灯泡。

注重空气质量的综合治理

首尔市通过发展公共交通、推广环保汽车、控制微尘等一系列措施，来全面改善空气的质量。首尔市的公共交通体系十分发达而便捷，地铁线路延伸到市区的每一个角落。最新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在首尔 64%的上班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公共交通的普及，减少了交通拥堵现象，车辆通行速度提高了 30%。这也被认为是首尔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一个有效方法。另一方面，大力普及环保汽车，如市民购买比一般汽车排放量少约 35%的混合动力汽车或低公害汽车，可免高峰时段通行费，提供公共停车场折扣等多种优惠。为减少氮氧化合物等大气污染物质的排放，首尔市把 99.7%的市区公交车和 91.2%的小区公交车更换为更节能低碳的天然气公交车；在大型油车上安装 PM-NOx 同步减排装置，为超过一定行车里程的出租车安装三元触酶装置，扩大了 CNG 汽车的使用，等等。此外，对 13700 多名市内公共汽车驾驶员的不环保、不经济的驾驶方法进行驾驶习惯的纠正教育。积极推进柴油车和建筑机械氮氧化合物减排的示范项目，加强对建筑取暖领域锅炉的管理，将家庭用小型锅炉换成低氮氧化合物排放的产品。还通过对建筑工地尘土的控制、道路洒水清扫、普及四季皆可使用的道路粉尘吸入清扫车等一系列措施，有效减少大气中的微尘浓度。

同时，加强对空气质量的管控和预警，对臭氧和微细颗粒物等与市民健康直接相关的大气污染物质的浓度进行分阶段检测。完善室内空气质量管理系统，对健康敏感人群的使用设施进行现场勘查和咨询，并进行有效的室内空气质量管理。一系列政策举措的全面实施，有效地改善了首尔市的空气质量，首尔市年平均微细颗粒物浓度从 2002 年的 76ug/m³减少到 2012 年的 41 ug/m³。

注重废弃资源的循环利用

首尔市致力于发展成为世界领先的循环利用城市，通过出台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改善循环利用产品分离收集体系，实现废弃资源的循环利用。一是实行垃圾排放“ 从量制 ”。排放者根据所排放的垃圾数量负担垃圾处理费用的制度，原则是“ 排者自负，多排多负 ”。该制度的实行对于减少垃圾排放起到了明显的作用。首尔市的垃圾排放从 1995 年的每天 15000 多吨，减少到 2012 年的 9440 多吨。二是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垃圾回收和减排的制度。比如，首尔市开展了“ 回收利用站 ”工程。在公共停车场或空地、公园等处设立可回收垃圾站，由此吸引附近居民亲自将废纸、废塑料瓶、废铁等带到指定场所分离扔掉。回收管理者由当地以收废纸为生的老人担任，当地产生的可回收用品由专门的回收利用社会性企业购入，并将收废品的金额支付给老人，并实施保障各可回收利用品种保持在一定价格水平上的“ 可回收用品回收补偿金制 ”。又比如，首尔市实施了大型废弃家电免费上门收取体系。该制度实行之后，收取的冰箱保持原样的比例从原来的 20%提高到 90%，从而大幅度减少由于机体损伤导致冷酶泄漏等所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此外，在公共机关、大型流通中心、学校等废品大量排放的场所倡导“ 废弃物 Zero 化工程 ”。为鼓励大型流通中心自发开展运动，还计划发放“ 废弃物 Zero 店铺 ”认证标志，对成果好的流通中心实施免除指导检查等各种鼓励措施。三是最大限度地实现垃圾再利用和能源化。首尔市政府对垃圾的管理观念已由过去的清扫清洁变为最大限度地实现垃圾的资源化，而相关部门的职能也由单纯的收集掩埋垃圾转变为循环利用垃圾。在实行严格的垃圾分类制度的基础上，首尔市从 1996 年开始建设垃圾焚烧设施，迄今已建成 4 处。这些设施的作用不仅是焚烧垃圾，更重要的是在焚烧过程中获取热能用来发电或供暖。2011 年首尔市废弃资源循环利用率为 43.5%，2013 年预计可以达到 46%，计划到 2030 年达到世界循环利用率最高城市德国法兰克福 66%的水平。

注重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发动全体市民广泛参与到低碳节能环保行动当中来，是首尔市建设世界气候环境“ 首善之都 ”的最大动力和支撑。围绕“ 减少核电，采用新能源 ”的目标，近年来，首尔社会各界组织了一系列的节能低碳活动，营造出了全民参与节能的浓厚氛围。比如，为传播节能文化，首尔市在每月的 22 号晚上都会进行一个小时的熄灯运动，并称之为“ 幸福熄灯 ”。组织成立了由 2 万多名学生组成的首尔能源守护天使团，在学校、家庭等多个领域开展实践活动，让学生们能够从小养成环保习惯。积极倡导市民不开私家车，每年举行“ 嗨！首尔 ”的自行车大巡游，努力营造“ 没有私车的日子 ”。通过活跃“ 光化门希望分享市场 ”传播再利用的文化理念，每月、每季在市中心光化门广场分不同主题开放特色市场，市民可以将自己不再使用的、但仍然具有再利用价值的物品拿到市场上低价出售给需要的人，收入的一部分用于慈善。最为重要的，通过此活动宣传了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理念。首尔市还计划增加直接观察、倾听、接触型的体验式环境教育课程，为子孙后代编撰定制型环境教育教材《小环和小镜》，从幼儿园到小学进行普及，从小养成绿色生活的习惯。同时，首尔市将垃圾焚烧场作为新能源地标，在世界杯公园建造“ 首尔能源梦想中心 ”，为让人们体会到能源的珍贵，还运营了“ 环境旅程 ”的活动项目。当然，首尔市最具代表性的市民参与项目是环保积分制，该制度根据家庭和楼宇的电力、上下水、城市煤气、地区取暖的节约使用量获取积分的环保产品，是通过交通充值卡等方式获得积分奖励的节能项目。这一项目获得了 2013 年度联合国公共行政奖。

注重自然生态与城市的融合

首尔市在城市治理中十分重视对自然生态的营造和恢复，努力建设人水相亲、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城市。比如，为了增加城市绿地的覆盖率，自 2002 年开始，首尔市实施屋顶绿化补贴政策，10 年来已有近 600 个屋顶由此变绿，总面积近 25 万平方米。又比如，首尔市把曾经最大的且污染严重的垃圾填埋场——兰芝岛，通过持续数年的生态修复工程，改造成风景宜人的生态公园，成为首尔市民休闲的好地方。自 2007 年起，首尔市开始实施“ 汉江复兴计划 ”，这也是迄今为止人类最大的河道恢复工程之一。首尔市政府计划在 2007—2030 年期间投资 5431 亿韩元（约 489 亿美元）治理汉江首尔段，重点目标是增加生物多样性，自然河岸的比例从 14%提高到 87%，以满足生物栖息和人类亲水需求，实现生态、文化、环境、历史体验等方面的有机结合。

而最值得称道的是清溪川修复工程。清溪川是贯穿首尔南北、有 600 多年历史的河流，全长 5.8 公里。在工业化初期，因周边污水排放而成为臭水沟，政府不得不历时 10 年、花费巨资将河面用钢筋水泥覆盖，使之成为城市道路。随着城市发展对青山绿水渴求的增长，2002—2005 年首尔启动了清溪川改造工程，掀开覆盖河面的钢筋水泥，改造河流水体，建设人文景观。现在清溪川已成为首尔市中心景色怡人的风光带，为人们提供了一处感受文化和亲近自然的理想天地。

（上接第 1 版）

“ 一企一策 ”重点培育，领军企业竞相涌现

记者：刚才您提到，科技型中小企业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涌现出一批科技小巨人和创新型领军企业。请您具体讲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黄兴国：我们说的小巨人企业，是指主营业务收入超过 1 亿元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它们处在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顶端，块头大、作用突出。从经济效益看，一个小巨人往往抵得上几十，甚至几百个中小企业。从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创新引领驱动、知名度影响力扩大等综合效益看，小巨人的价值更是无可估量。现在全市 5 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总产值是 1.2 万亿元，2400 多家小巨人就占到了 1 万亿元。

创新型领军企业是小巨人企业中的佼佼者，技术领先，竞争力强，规模大，前景好，主营业务收入很多都超过 10 亿元，有的达到几十亿元。2013 年，我们启动实施了科技小巨人领军企业培育工程，筛选 206 家企业为重点培育对象，围绕解决企业发展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进一步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组成专门帮扶工作组，建立党政领导联系重点培育企业制度，对每一个重点培育的领军企业，都确定一名处级以上干部作为联系人，采取“ 一企一策 ”，开展“ 一对一 ”服务，深入企业摸清情况，量身定做，明确发展路径、目标和措施，帮助他们建立博士后工作站、院士工作站、企业研发中心，切实解决资金困难，创新商业模式，扩大销售市场，推动企业不断做优做强做大。

我们确定的 200 多家领军企业，2013 年主营业务收入达到 1500 亿元，75%的企业集中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全部都有稳定的科技研发团队，拥有专利 1.1 万多项，70%的领军企业排名位居细分行业前三位。全市涌现出了天士力制药、长荣印刷、力神电池、天地伟业、天大求实、航天精工等一大批创新型领军企业，成为提高我市科技创新能力、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生力军。

从“ 铺天盖地 ”到“ 顶天立地 ”

记者：应当说，天津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局，并且顺利地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请问下一步发展的目标和主要思路又是什么？

黄兴国：可以说，在天津未来的发展中，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一子落定，满盘皆活。在下一步工作中，我们将坚持量的扩大与质的提高相结合，重点是质的提高，既要“ 铺天盖地 ”，更要“ 顶天立地 ”。怎么来实现“ 顶天立地 ”，就是要做优做强做大，在提升水平、增强实力、壮大规模上狠下功夫。这里面做优是根本，做强是核心，不优不强就做不大，做大了也难以持续。因此，我们把工作重点确定为“ 五个下功夫 ”，也就是：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上下功夫，在加快培育科技领军企业上下功夫，在促进企业集约集群集聚发展上下功夫，在加大金融服务支持上下功夫，在抓好招商引资引技引智上下功夫。

记者：天津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中，很大一部分是从原有企业转型升级来的。今年，天津提出了实施“ 万企转型升级 ”行动计划，目前进展如何？

黄兴国：现在，全国有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普遍存在“ 散弱低粗污 ”问题，空间布局分散，竞争力弱，经济效益低，生产经营粗放，污染严重。我们根据天津实际情况，制定了“ 万企转型升级 ”行动计划。春节后一上班，市委、市政府就召开了动员会，出台了 10 项政策措施。确定的总体目标是：通过 3 年努力，到 2016 年年底，首批确定的 1.2 万家中小企业实现转型升级。具体是：企业整体效益提高 50%以上，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达到 6000 家以上；工业园区每公顷税收提高 50%，商务楼宇每平方米税收提高 50%；单位增加值能耗累计下降 15%，污染物排放明显下降，努力实现结构优化、效益提高、就业不减、资源节约、环境改善。做到一样的土地不一样的效益，一样的土地不一样的产出，一样的土地不一样的实惠，一样的土地不一样的环境质量。

为实现上述目标，我们主要以“ 四个一批 ”为主要路径。一是改造提升一批。支持企业加大技改投入，加快生产工艺、装备的升级换代，逐步建立技术中心和研发机构。鼓励企业开发新产品，加快产品更新换代，走“ 专精特新 ”的发展路子。引导企业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促进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信息化。二是产业转型一批。引导支持企业从低附加值领域转向高附加值领域，从传统工业、传统服务业转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支持企业利用网络创新商业模式和盈利模式，大力发展 B2B、B2C 等电子商务。三是关停重组一批。淘汰落后产能，整治“ 三高两低 ”企业，关停一批环境严重污染、安全隐患突出的企业。支持龙头企业整合兼并一批经营不善、长期亏损的企业，支持有条件的企业通过资产收购、产权受让、合资合作等方式联合重组。四是载体升级一批。对各类工业园区、商务楼宇，进行整合改造提升。引导园区外企业向示范工业园区、商务楼宇集聚，培育发展电子商务、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文化创意、软件设计等特色产业集群。